

包遵彭
李定一
吳相湘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二冊

——
中西文化交流

正中書局印行

包遵彭
李定一
吳相湘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二冊

——
中西文化交流

正中書局印行

叙 言

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之鵠的，不僅在彙輯若干論文以供閱讀而已，實另有深遠的寓意。

數十年來國人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並非不辛勤，但成績却並不如理想，除史料浩瀚無涯際與史事紛纒難紬繹的原因而外，研究者不易超脫時代環境所加諸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儘管成績不如理想，但總是一個時代學者們心血的結晶，它應該受到我們的重視與愛護，它值得被提出來作為今後研究者的里程碑。

蒐輯史料以廣流傳，整理史料以利閱讀，審訂史料以辨真贗等事，僅僅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工作，但最重要的還是憑藉這些史料去瞭解歷史的真相，闡釋史事的脈絡，尋求歷史的知識，纔是歷史研究的目的。我們要結算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成果，當然祇有從他們的論文中去找答案。研讀過這些論文之後，目前從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士不致陷於無處着手或枉費功夫的苦惱中。

要周覽這些學術論文確非易事，因為它們多散見數十年來各種期刊之中。經此次大動亂，中華民國現在所保存者，幾已多成孤本，存留大陸匪區者，則遭有計劃之銷毀。我們豈能任這些可珍貴的學術成果湮沒而不能流傳？本論叢所輯的雖未必完備，但循此途徑，必可達到保存數十年來國人

研究中國近代史成果，並爲今後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樹立里程碑的目標。

尤有進者，共匪正在大陸瘋狂進行膺造中國歷史的工作，特別重視的當然是中國近代史。他們一方面輯印經過刪改後的史料，一方面歪曲這些史料，撰寫成符合俄寇利益的歷史。進行這項工作時，必須先消滅以往學者在正常情況下的成績。羅爾綱被迫完全否定自己從前的研究結論，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參看本論叢第一輯第四冊導論）。這椿例證，更加強我們要編纂本書的決心，更警惕我們認識自身責任的重大。

在編纂的過程中，我們對以往國人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曾略加檢討。所以每一冊的前面，都撰寫導論，除掉介紹內容外，並將我們對該問題研究的見解提出。

創造時代者必先瞭解他所處那個時代的真相與淵源。祇有在明白過去苦難的所由來以後，纔可能爲將來帶來新幸福；沒有不接受前人經驗的民族能繼續自由獨立地生存在世界上，締造將來的明鏡是對過去作透澈的反省。我們渴求歷史知識的目的在此，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的知識，因惟有它最能滿足我們這方面的需要，惟有它最能解除我們的徬徨與空虛。所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不僅應當正視他們這個時代使命，而且必須集中他們的研究工作，努力去達成這個目標。

凡 例

(一) 本論叢每輯分十冊，每冊約十五萬字至二十萬字。以一專題爲中心，選輯近四十年來我國學者專家已發表的有關論文或專著節錄。

(二) 本論叢爲篇幅所限，故各論文原有之註釋除特別需要者外，均刪去不錄。

(三) 每論文末均註明原載書刊名目發表年月，讀者有需要時，可自查對。

(四) 本論叢第一輯祇選輯國人用本國文字所發表之論著，本國學者用外文撰寫之論文或國人翻譯外國學者之論著，均不輯入。

(五)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在臺灣省印行之有關論著，爲避免重複計，均不選入本論叢第一輯中。本書編者有關論著，亦不輯錄，只存其目，以便儘量容納各家論文。

(六) 本論叢之目的在保存原作者之見解，故對所輯各論文之論斷並無贊同或反對之意。

(七) 本論叢編輯過程中，承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中國文學系圖書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館編輯委員會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陽明山莊圖書館等及其他私人藏書家給予協助，謹此誌謝。

導論

將歷史分期敘述或研究雖然是不合理的權宜辦法，但也是不可能忽略的手段或步驟。中國近代史的範圍問題，迄今各家尚有歧見，未得定論。我們將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本冊）與十七八世紀的中外關係（本論叢第一輯第三冊）納入中國近代史範疇之內，不僅不是貿貿然的抉擇，而且是經過審慎思考後的決定。

我國傳統上是以朝代為歷史分期的標準。到清季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後，分期的華繩纔開始起變化。新的歷史分期法層出不窮，而其涵義亦多朦朧混沌。雖曾激起過不少爭論，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比較確切的準則。我們不必因此視之為不幸，這不過是過渡時期難免的紛亂。即以我們這部叢書所包括的這一段時期的歷史而言，便有許多不同的名辭與形形色色的解說：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世史、中國現代史、中國近百年史與乎照英文硬譯而成的近代中國史（Modern Chinese History）等等稱呼。這些名辭提出的經過，各家應用時涵義模糊不清的情形，本論叢第一輯首冊「史學與史料」的「導論」中，已有較詳盡的敘述，不再贅言。但有一樁事實是我們必須提出的，即各家對劃分斷代的原因，沒有一致的意見，因此他們對這一階段歷史應該包括的範圍也就各持一說。

最流行的說法是中國近代史應該從鴉片戰爭或南京條約開始，因為這是西洋用武力強迫中國訂立屈

辱條約的開端，中外關係從此有了改變。多數歐美的史學家都同意這個觀點，因為就他們的立場而言，自然是重視中國對外的關係。但我們對這種分期的主張，認為頗有可資商榷之處：第一、敘述或研究一個民族的整個歷史，似乎不應該過分自其對外關係着眼，儘管這個時期的外交問題很重要，但外交究竟祇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教育以及全國朝野對世界大勢的認識……等各方面的綜合情況所表現於對外關係的現象而已。偏重此一現象的結果，很可能晦蔽我們對決定事物因果的基本因素的瞭解（對外交史的專門研究或專書敘述，純然是另一回事，似又當別論）。

第二、即令我們願意從中外關係的改變上着眼去劃定中國近代史的範圍，也不能說一定應該從南京條約開始，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的尼布楚條約似乎不當被忽視。俄國人的積極侵略黑龍江流域始於一六五〇年，中國準備抵禦俄國侵略始於一六八二年，至尼布楚條約的訂立，前後歷時八年，中俄戰爭兩次，始簽訂條約——中國第一次與歐洲國家訂立的條約。尼布楚條約與南京條約同為中國與歐洲國家經過戰爭以後所訂立的和約；所不同的祇是前者是我國戰勝的結果，後者是城下之盟；前者係來自大陸的侵略，後者係來自海洋的攻擊而已。即令重視中外關係的改變，我們有什麼理由祇重視海洋而忽略大陸，祇看重屈辱而忽視勝利？

第三、倘若認為南京條約之後，中國始置身國際舞台而尼布楚條約則否，因此便以南京條約為中國轉入近代的起點。這種看法的理由也不充足。因為在中國朝野人士的心目中，鴉片戰爭不過是堂堂天朝偶爾被「夷狄」擊敗而已，並不承認這是一切問題的開始（祇有極少數人例外，但沒有實際影響）。觀

乎葉名琛在廣州對付英人的辦法與朝野對「修約」問題所持的意見便知所了。中國真正在客觀環境與主觀意識上都轉入近代，從此開始認識國際政治、努力適應新環境，是英法聯軍入北京（一八六〇）以後的事。所以，從這一個立場着眼，一八六〇年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顯得較南京條約更有重要性。且自尼布楚條約中國大陸上來的侵略抑制着後，直到一八五八年的愛琿條約，與一八六〇年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關係纔作急劇的轉變。從此中國同時遭受來自大陸與海洋兩方面的侵略更亟，這種由英俄兩國所造成的對中國的鉗形攻勢，纔是中國近百年來遭受侵略的基本形勢。故從對外的關係着眼，一八六〇年應該是特別值得重視的年代。

第四、鴉片戰爭之後七年（一八四九），俄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命莫拉維岳夫（N. Muraviev）爲西伯利亞東部總督，開始大規模侵略中國，至一八六〇年止，十一年之間，不費一兵一矢坐得二百七十餘萬方公里的領土（相當於二十六個江蘇省或八十餘個臺灣省的面積），此後仍然繼續利用欺騙、恫嚇、敲詐、甘言與培植傀儡……等方法，侵佔中國的領土，直到民國三十八年鯨吞整個中國大陸。事實告訴我們，俄國是中國最大的敵人，而相反地我國人對俄國的侵略最缺乏警覺。原因何在？答案也許很多。從歷史的觀點去找答案，我們發現俄國最能利用中國遭受英法等國城下之盟的刺激所產生的仇恨與恐懼的心理，誇張並煽動中國國民對英法等國的仇恨及恐懼，藉以掩蔽其對中國的侵略行爲。所以俄國人特別強調鴉片戰爭，蘇俄衣鉢相傳，而且手法更高明。所謂南京條約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開端，所謂中國的苦難完全導源於不平等條約，而南京條約便是不平等條約的尾閥等等宣傳，不一而足。國人與乎

若干寫歷史教科書的人士，習焉不察，積非成是，衆口一辭，無意中爲俄國的侵略鋪下康莊大道。今日我們痛定思痛實不應當重蹈覆轍，貽禍後世了。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無論從原則上（第一點）、從事實上（第二三兩點）或從利害上（第四點）分析，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的說法，都值得我們審慎攷慮，我們——研究歷史的人都應該很嚴肅地反省。

另有兩點意見要特別提出說明的：其一，上述四個理由並不表示我們認爲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不應該再受重視。這樁史事對我國有極深遠的影響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我們祇是從各方面去說明僅重視南京條約或太重視南京條約的欠妥處，並進一步闡釋我們不敢苟同將鴉片戰爭當作中國近代史開端的原因而已。其次，我們以爲中國近代外交史的專史研究或著述，從鴉片戰爭開始是無可厚非的，因爲事實上南京條約之後我國纔被迫逐漸放棄我們傳統的「外交」觀念與方式並開始逐步接受西洋國際社會的觀念。研究與撰述中國近代外交史以鴉片戰爭開端，自然是有其理由的。

中國近代史的定名是超脫傳統的以王朝爲斷代標準的窠臼的，我們歷史上並沒有有一個「近代」朝、乃衆所周知的事實。是因其距離我們時代很近，所以稱之爲近代史嗎？恐怕也不會如是簡單，一則時間的遠近本是相對的，再則「現代」纔是代表距離我們最近時期的名辭。

我們之所以不取王朝標準而有近代史的稱呼，純然是因爲這個時代歷史演進的基本因素有了改變，亦即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有了接觸後，中國歷史演進所遵循的準繩受到影響而生變化，這種變化是以往

所無的，因此我們乃將中西文化接觸後中華民族歷史發展在本質上開始變動後的歷史，名之曰中國近代史。換言之，中國近代史的範圍應該包括中西文化開始接觸的歷史，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特色是在闡明中國在與西方文化接觸後各方面——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學術上的、社會上的、外交上的、軍事上的與思想上逐步的變化。

我們贊同中國近代史應該自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之交流開端的理由，除掉上述從整個歷史演進的基本因素的改變着眼而外，尚有幾個其他的理由，也願趁此一提，以供國人參考：

第一、尼布楚條約是我國軍事與外交的勝利，南京條約則為失敗。我們雅不願國人過分強調這種勝利或失敗。因為沈湎在過去的勝利與乎因曾經失敗而沮喪，或甚至將本身的一切災難都譏諸一次失敗之中，都是不健全的心理。緬懷疇昔的光榮應該是孤寂的老人在垂死以前的唯一悵樂，將一切坎坷災難都譏某一次失敗或歸罪於某一個敵人是爭氣的敗家子在破窖中寫自傳時的飾詞。曾經有過勝利光榮的民族，有時仍不免覆亡；經歷若干時戰敗的國家，也常常可以復興。問題是在那個民族有無在世界上獨立生存下去的理由——它對人類文化發展有無真正的貢獻？有無再獨立生存下去的勇氣——它是否喪失掉發展對人類文化有真正貢獻的能力？這便是我們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研究歷史學的人，祇能從過去的歷史中去尋求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這一段史事，是我們能夠提供的證據（讀者可參閱本冊所蒐輯各文）。將這一段史事與後日發生的若干磨難連在一齊，不僅不是無益，而且有積極性的功能。

第二、南京條約以後國內與外所發生的許多影響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若干寫歷史書的人都任意以當時的人「愚昧無識」、「保守頑固」、「荒謬絕倫」……等理由去解釋。「愚昧無識」或「荒謬絕倫」的人們之子孫是不可能突然變得聰明合理的！追溯許多史事發生的本源，實都種因於若干年前。例如八國聯軍，肇因於義和團之亂，義和團之亂種因於數十年來的教案，教案的發生，原因固屬多端，但楊光先與吳德芝等人在清初反對基督教的言論所遺留在民間的影響，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一般人反對基督教的主要原因。而明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的南京教案（參閱本冊第十一篇）亦可與後來頻仍的教案比較參考。了解這一連串的史事後，我們便不會輕易將義和團事變當作單純的「愚昧無識」的舉動了。從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開始的中國近代史，對瞭解歷史的真象，探求問題的本原有很大的幫助。

第三、中國近代史是可以自成單元供人閱讀的。鴉片戰爭或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苦難的開始，倘若我們從悲難發端，演變下來苦難與日俱增，到今日而達頂點。我們民族的苦難如何能解除？何日能解除？如果單純從鴉片戰爭以後發展的趨勢推下去，可能有人會想到我中華民族的苦難能不能解除的問題上去。無疑地，這種心理雖無事實根據，但卻極端有害。我們敘述的人為什麼不讓中國近代史有一個正常並可夠得上輝煌的開端呢？何況事實上又確乎如斯呢！

本冊所輯十四篇論文，特別偏重中國文化對西洋文化的影響方面，我們以為這是當前國人值得一知道的事實。

第一篇是張蔭麟氏的「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這一篇文章裏，著者將當時西學輸入中國的情形，作一概括的敘述，其所附之「西學之著作表」，目前已有一些修正之處，不過爲了存真（見本叢書「編輯要旨」），仍然附錄。何柄松氏的「中國文化西傳考」（第二篇）是將中國文化輸入西方的概略情形以及中國文化在西洋所產生的影響作一般的介紹，著者在結論時很感慨地說：「現在歐洲人的藐視中國文化，固然徒顯其淺陋，他們從前那樣崇拜中國，甚至主張『全盤中化』，亦未免有點矯情。」的確任何中國人在讀完他這一篇文章後都很難不感慨萬分。當然，我們不希望國人止於感慨而已，應該將它當作今世的強心針看。

第三篇到第八篇那六篇論文，是從各方面更深入、更詳細地將中國文化在西洋所生的影響敘出。從思想上、神學上、政治上、文學藝術上、習俗上，甚至園林的建築上，看出中國所賜於歐洲者是何等的豐富，歐洲受到中國的影響是何等的鉅大。第九篇柳詒徵氏的「中國文化西被之商榷」係討論晚近中國文化向外宣揚問題，可與清明之際中國文化西播的情形參證比較讀之。

第十篇徐宗澤氏的「張獻忠入川與耶蘇會士」是我們瞭解基督教傳教士在明末天下大亂時的處境所難得的報導。張維華氏的「南京教案」（第十一篇）是當年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時的一樁大事，也可以算作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受人重視的教案。我們可將沈淮攻擊基督教的理由與兩百餘年後清季士大夫階級反對基督教的言論比較參證。全漢昇氏的「明末清初反對西洋文化的言論」（第十二篇），乃著者「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一文的節錄，足使我們概知當年反對西洋文化言論的一般。方豪氏的「明清之際中西

血統之混合」(第十三篇)，提出一個相當重要而復未被人重視的問題。

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民國二十三年)及張星娘氏的「歐化東漸史」乃大陸陷匪前較普及之專史著作，郭斌佳氏的「評歐化東漸史」(第十四篇)可使我們略知其書梗概。

自民國初年以來，我國學者對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問題相當感興趣，發表的論文很多，本冊限於篇幅，祇能輯入極小部分。但是我們卻對之抱有極大的期望，但願這些文章，能夠在靜靜的潭水裏漾起一些漣漪，再激盪而成壯闊的波瀾！

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二冊

——中西文化交流目錄（明末清初）

導論

一、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	張蔭麟·····	一
二、中國文化西傳考·····	何炳松·····	三三
三、宋儒理學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	朱謙之·····	六三
四、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	方重·····	七九
五、十七八世紀英國流行的中國思想·····	范存忠·····	一一〇
六、論羅柯柯作風·····	朱傑勤·····	一三三
七、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	謝扶雅·····	一四七
八、十八世紀歐洲之中國園林·····	陳受頤·····	一五七
九、中國文化西被之商榷·····	柳貽徵·····	一九〇
十、張獻忠入川與耶穌會士·····	徐宗澤·····	一九六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二冊

十一、南京教案始末·····	張維華·····	二〇一
十二、明末清初反對西洋文化的言論·····	全漢昇·····	二二七
十三、明清之際中西血統之混合·····	方豪·····	二三六
十四、評歐化東漸史·····	郭斌佳·····	二四五

一、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攷略

張蔭麟

西方學術之輸入我國，可分爲二期：第一期，始於明萬歷中葉（一五七三——一六一九），盛於清康熙間（一六六二——一七二二），至乾隆中（一七三六——一七九五）而絕；第二期，始於清咸豐（一八五二——一八六二）同治（一八六二——一八七四）間之講求洋務，以迄今日。茲篇之職務，在整理第一期西學輸入之史蹟，而說明其與我國學術界之關係。

此期西學之輸入，爲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士傳教之附帶事業。其所輸入以天文學爲主，數學次之，物理學又次之，而其餘則附庸焉。其在我國建設最大者爲天文學，與清代學術團體關係最深者，天文學與數學惟均。而天文學實最先與我國學術界發生影響，茲請先述之。

一、西方天文學之初輸入

我國之天文學，截至明代止，已有三千餘年之歷史。其間亦嘗有外國天文學之輸入。惟歐洲天文學之入中國，則自耶穌會教士始。

①利瑪竇之介紹西方天文學——耶穌會教士之最先傳教中國內地者，爲意大利人利瑪竇，（Ricci, Matteo）氏於萬歷九年（一五八一）抵廣州。利氏少學於 The Roman College (in Rome)，嘗專研天文學及數學。既入中國，撰乾坤體義，其上卷言天象；述日月蝕由於日月與地球之相掩，及七曜與地體之比例。

又著經天該，將其時西方所已測知諸恆星，造爲歌訣，以便觀象者之記誦。嘗製渾天儀、天球儀、地球儀諸器以示人。徐光啓、李之藻、周子愚輩從之遊，習其術。利氏嘗以簡平儀，授李之藻；之藻耳受手書，得其用法，因闡其術作渾蓋通憲圖說。此實中國人介紹西洋天文學之第一部著作。

利瑪竇之入北京貢方物（萬歷九年即一五八一）也，其上疏自謂：於「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祕；製器觀象，及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脗合。」又請「披露於至尊之前」。時明代歷法，猶踵大統回天之舊。自成化（一四六五）以後，遠天益遠，紛紛議改；而臺官泥於舊聞，當事憚於改作。利氏卒未能用其所學而沒。

②明廷對於新法之需要——利氏既卒，繼之而來之教士，多以天文學稱於中國；從之習其術者頗衆。及萬歷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十一月日蝕，欽天監預推不驗，禮部遂奏請博求知歷者與監官晝夜推測。於是五官正周子愚乃上疏請令西洋人龐迪我（Panotia, Diago de）熊三拔（Ursis, Sabathinus de）等盡譯攜來西法之書。

禮部因疏請，以邢雲路主理曆事；而以徐光啓、李之藻、龐迪我、熊三拔，同譯西法，俾雲路參訂修改。蓋雲路主改曆甚力，頗負知曆之名。然雲路乃舊曆家；其天文學知識實甚膚淺。時徐光啓適以疾南旋，乃召雲路，之藻入京董其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爲宗。

③西法之繼續輸入——萬歷四十一年（一六一三），之藻奏上西洋天文學說十四事，言地圓，日月蝕，及行星運行之理。疏中力言西法所以專長之故，竭力摧廓當時守舊自大之風；並論我國天文學所以